

## 房山商业部门大学生二十年去留管窥

刘树楸

我于 1981 年底从外地调回房山。安排在县政府财贸办公室工作。以后，这个单位几次变动和更名，但我一直没换地方。直到 2000 退休。在这个单位一下工作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我区商业部门或者说是房山国有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改革开放大潮之中风云变幻的二十年。可能是因为我上大学校门里混了几年，与和我类似人员气味相投，对二十年中房山商业部门大学生来来去去的情况，在头脑中留下较深印记。

我 1982 年刚调回房山时，财贸部门既管钱又管物，还是个重要部门。领导机关在县委设财贸部，县政府设财贸办公室，所管商业单位有供销社、粮食局、工业品公司、副食品公司、服务公司、外贸公司等六个县直单位。还有石油、食品、药材、菜蔬、烟酒等五个公司属市县（区）双管单位。在 1987 年划归计委口以前，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银行、保险等单位也归其管理。据 1986 年统计数字，财贸部门全系统干部职工共 10151 人。仍然主导着全县城乡商品市场的商业部门干部职工共 9043 人。但大学生都少的出人意外，就我所了解，在县委财贸部、县政府财贸办公室，两个财贸部门的领导机关共约 20 左右人中，只有我是一个是从正规的大学校门走出来的。据我不完全了解，在所属商业单位近万名干部职工中只有服务公司和外贸公司各有一个副经理是正规大学毕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劲吹，提

拔干部强调学历，房山商业部门因此出现一些较明显变化。一是县里机构调整，撤销财贸部和财贸办公室，合并成立财政贸易委员会。一名与爱人一同从外地调回，在外贸公司当上副经理的大学生，到财贸委任了副书记。一名从外地调回，在物资局当上了局长的大学生，调到财贸委任了副主任。二是一些缺少学历的工作人员，被选送到区党校、市财贸干部管理学院等可以拿到相应学历的有关教育机构去深造（或自学），使有较高学历的财贸工作人员较快多了起来。三是文革后大学恢复招生，大学生逐年多了起来，一些大学生被分配到了财贸部门。其中两个北京商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去了工业品公司，一个去了供销社。两个北京财贸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到了财贸委业务科，一个到了财贸中专校。还有一个学蔬菜的大学生分配到菜蔬公司。四是一些分配到外地工作的本地大学生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被调了回来，到了商业部门。如上面提到的那个财贸委副书记和副主任以及粮食局从外地调回的两个大学生和我本人都是如此。五是在 1987 年房山与燕山合并中一个北京商学院毕业生以原燕山财贸办主任的位子来合并后的财贸委当了主任。等等这些情况使房山财贸部门的大学生不仅多了起来，有的还当了领导。

但另一种情况让人有些困惑。先是那位在 1984 年成立财贸委时被任为副书记的大学生，在房燕合并中区里从全盘考虑，调整到了区党史办。不久那位从燕山财办来任了财贸委主任的那位大学生干了时间不是很长调回了原工作过的商业部。大约与此同时，那位从物资局长位置来任财贸委副主任的大学生调到了房山宾馆。令人可惜的是那

两个分配到工业品公司和供销社的北京商学院的毕业生干了时间都不是很长，分别调出了房山；那两个北京财贸学院的毕业生，一个从财贸委业务科被调到副食品公司，从这个公司又被放到所属的中专校，最后自己调到了燕山。另一个从财贸中专调到了区里农口。那位分配到菜蔬公司学蔬菜的大学生也调到了区农口。还有一个情况也让人费解，1985年左右曾先后分到我区一些学商业经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本来应来商业部门，但一个没来成，全到了其他部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商委领导认识到商委缺乏知识人才，为改变这种状况，曾想招收一些高学历人才。但下了不少功夫，只招来一个随北京知青来京的外地大学生。在其它所属单位只粮食局进来两个从外地调回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北京化工学院毕业，先到粮食局所属的油脂厂当厂长，后又在粮食局当了副局长。一个北京机械学院毕业生，在粮食局机关工作。

以上就是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房山商业部门大学生进出去留的一个基本情况。在万名左右商业干部职工中，去去留留只有这么区区可数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他们的进出去留中可看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来了留下来的较少，二是来后呆的时间长的较少，三是来的都是普通大学毕业。北大、清华等名校和硕士以上学历的长时间是个空白；四是在大学学商业和财贸的少，学其他专业的多；五是年龄小的少，年龄大的多。他们多是从外地调回，上世纪末都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年轻人基本是个空白。

对于以上情况，在一段时间内着实有些不理解。但时间稍长，慢

慢就会知道，里边的原委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国家的建立时间尚短，多年积累的困难堆积如山，短时间内，国家还舒不出太多的钱来发展高等教育，大学生还很少。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高校十年未招生，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培养出来，分配下去。文革前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家还有政策，除某些特殊需要，在一些部门和学校招收部分大学生外，号召和鼓励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边远地方去。比较明显的例子，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校所有毕业生北京一个不留，全部分到了其他地区，我校往届及其他学校也有类似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分到北京的大学生本来就少，而国家和北京还有另一项政策，就是为了控制北京人口过快增长，进京人口严格控制，不是特殊情况调入北京相当困难。比如我们房山原则是调出北京一个才可以从外地调入一个。我和其他几个从外地调回的大学生，是享受了当时国家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两地分居困难的政策才回到了房山。就是因为控制进京人口的政策，咱们房山需要和外地想来房山发展的大学生来不了房山。我清楚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委领导认识到商委缺乏知识人才的情况，曾想从外地调入一些人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做了不少工作也没有引进来。可以说这是商委系统大学生人员少的原因之一。

对于人员的需求与劳动性质和管理所需有很大关系。解放以后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计划经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计划经济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那时的商业，特别是区县以下的商业，相当程

度是按计划也就是按上级指出办事。商业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行政单位即各级党政机关分配商品的工具。那时的商业劳动，实质上是简单劳动，任何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都能胜任。这种劳动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需求并不是特别迫切，大学生来的少，应该在情理之中。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日益深化，计划经济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化。商品日益丰富，社会商业迅速崛起，对国合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新的高的要求。需要以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加强对国合商业进行改造。而国合商业并没有人才储备，新的人才面对困难当然也不愿进来。在中央反复公开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以后，国合商业的管理出现放松趋向，一些人员以各种隐蔽的甚至公开方式向企业伸手。甚至宁愿企业垮掉，也不愿能人进来，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流于形式，这可能也是大学生来的少的一个原因。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欢不欢迎，是由自己的表现和实际水平决定的。十年文革动乱中，一些大学生的表现让人实在不满和失望。他们虽然有文凭，但实际水平令人担忧。文革中我们国家所以出现那样的乱象，大学生们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四人帮的操纵和鼓动下，充当动乱的急先锋，不论是在北京、在外地还是在房山，领头闹事的多是一些大学生。北京的五大领袖都是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已毕业和在读的学生，他们带头打砸抢，挑动武斗，乱批乱斗，在人们心中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在一个时期和一些地方人们躲他们还来不及呢，当然不会欢迎他们。至于他们舒着的文凭和实际水平，也令人怀疑。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们名义上是

学毕业，舒着大学毕业证，可是他们根本没学到应学的东西。他们名义上是学制四年、五年或更长时间，但实际上因为要参加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上课多的上课三年，少的二年，再少的只有一年。因为他们这其中大多从 1964 年开始要搞一年“四清”，从 1966 年 6 月开始，停课参加一年或二年，甚至三年、四年的文化大革命，应学的根本没学，就舒上毕业证毕业了。这样的大学生能够有真才实学吗？人们不欢迎他们是理所应当的。

除以上几个原因外，我们房山行政区划变动较多，可能也是大学生少的一个原因，解放初房山、良乡是两个县，都归河北省管辖，一九五八年，两个县划归北京市，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从坨里往里还有个京西矿区。八十年代初，以燕化公司所在地为基础成立燕山区，同时，河北、大安山、南窖、班各庄、黄山店五个公社划为小矿区，归矿务局管辖。一九八七年，房山县和燕山区合并，成立房山区。一次次行政区划变动，使大量干部和工作人员要重新安排，而且影响时间较长。这多多少少肯定要影响大学生的进入，使其成为商业部门大学生少的一个原因。

以上这些都是本人一己之见和一孔之见，由于水平和资料有限，谬误难免，如能引起有识之士的观注和批评指正，将感到欣慰。

2018.8